

中国文库

· 艺术类 ·

中国书法史
宋辽金卷

曹宝麟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 国 文 库
艺 术 类

中国书法史

(宋辽金卷)

曹宝麟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曹宝麟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9

(中国文库)

ISBN 978-7-5343-8661-9

I. 中… II. 曹… III. 书法—美术史—中国—
辽宋金元时代 IV. 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670 号

责任编辑：胡新群 徐金平

整体设计：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董文权



《中国书法史》编撰工作委员会

顾问：沈 鹏

主任：张胜勇

副主任：朱关田

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丛文俊 白谦慎 朱关田 华人德 刘 恒

刘 涛 张胜勇 徐宗文 黄 悄 曹宝麟

《中国书法史》各卷编撰分工

丛文俊 先秦·秦代卷

华人德 两汉卷

刘 涛 魏晋南北朝卷

朱关田 隋唐五代卷

曹宝麟 宋辽金卷

黄 悄 元明卷

刘 恒 清代卷

174\“空淡一派矣，风旨殊另致” 第一章

202\余仲南米芾 第二章

目 录

13\余仲南米芾 第一章

第五章

131\宋米芾书武陵源记 第一章

333\宋米芾书寒食帖 第二章

225\米芾书跋前宋南 章六章

250\苏轼书风文翰因味古更 第一章

280\苏轼书黄州寒食帖 第二章

概 述 / 1

122\米芾书跋中宋南 章十章

第一章 北宋前期的书法 / 9

92\宋大观中 第一章

10\晚唐五代书风的延续 / 10 第二章

20\随波逐流的纷乱局面 / 24 第三章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书法 / 45

章八章

28\欧阳修与《集古录》 / 46 第一章

35\蔡襄的历史地位 / 65 第二章

33\中期的其他书家 / 79 第三章

33\神陵碑文宋 章九章

第三章 北宋后期的书法(上)——“尚意”书风的勃兴 / 97

92\苏轼在“尚意”书风中的砥柱作用 / 99 第一节

100\苏轼的“尚意”书法理论 / 110 第二节

110\自成一家始逼真——黄庭坚的书法创造 / 130 第三节

156\韵——黄庭坚书论的精髓 / 156 第四节

章十章

第四章 北宋后期的书法(中)——集古出新的巨匠米芾 / 169

第一节 “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171

第二节 米芾的书论 /202

目 录

第五章 北宋后期的书法(下)——其他名家和书论 /213

第一节 北宋后期的名家 /213

第二节 北宋后期的名家书论 /233

第六章 南宋前期的书法 /255

第一节 复古和因循之风的蔓延 /256

第二节 南宋前期的书学著作 /280

第七章 南宋中期的书法 /291

第一节 中兴四大家 /292

第二节 南宋中期的名家 /310

第三节 南宋中期的书学著作 /316

第八章 南宋后期的书法 /327

第一节 气息奄奄的南宋末书坛 /329

第二节 南宋晚期的书论 /342

第九章 宋代的刻帖 /353

第一节 《淳化阁帖》 /354

第二节 以《阁帖》为底本的丛帖 /359

第三节 其他各种丛帖 /363

第十章 辽金书法 /373

第一节 辽代书法 /374

第二节 金代书法 /385

附 录 / 405

宋辽金书法史大事年表 / 405

主要参考文献 / 477



。俚俗的宋淮南式和山地土史记。戈壁干涸处，淮南湖底
宋南望武侯，京师极重，鼎尖夏郊。宋北干甚更梗其，宋南的安翻
概述 换景炎朝出，麻主虽云始主而因，燕赵的败史指不帝皇博识
南国金卧，通文振豫丁书，金灭大辽古秦而兴陈巨然足也。葱岭南迦浦
丁翁肇建古秦而大姬。中立取武帝寒齿亡都于南夷又，夫一朝粗
景亥，灭嫂源随南朝王因横丁吉首新领南昌帝，宇音的辩支木越并天文

。且二胡(952)辛二兴群亦

已平靖，“且盈”尚且曾分瓦，辛遂百三丁耕兼苦苦匪敢其式震障宋
的升宋。又嵩阳人涿州义和昌，岸畔的单崇景只由宣祖守，奉天宫
育出文的碑宋晋易，应辟代国的食堪便得其巨土本基出，崇麟景贫出文
碑宋，宋大入文古宋晋，弃不出鼠山冠河朴文，近群典某的累赏良自其
通晦祖南盈殿辟以我

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的显德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统率殿前司禁军发动“陈桥兵变”，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幼主恭帝的政权，建立了宋朝。中原长达半

个世纪频繁易主的动乱局面终告结束。然而中国并未完全统一，十国最后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北汉被纳入大宋的版图，已经迟至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四年
庚辰(979)。除了北方由契丹族耶律氏所建的辽国之外，汉直一“紫堇”尚待南归，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大部分土地，总算重新归于统一的
中央集权政体的管辖之下。作为一个吸取以往教训，
通过强化文官统治和改革科举制度，从而使封建集权
更为稳固的王朝，它在疆域和国威两方面，无疑是有
史以来最为穷蹙不振的了。它始终未能消除外患凌逼
阴影的笼罩。先是与辽国达成丧权辱国的“澶渊之
盟”，承认异族对北方领土的统治，继而受党项族的西
夏所困扰，战不能胜的无奈，只得采取忍气吞声的姑
息政策。女真人崛起，新的强权取代了辽国的威胁，终
于在钦宗靖康二年(1127)，倾覆了赵宋的宗社。高宗

赵构南渡，建都于临安。历史上将此作为南北宋的分野。

偏安的南宋，其虚弱更甚于北宋。收复失地，重返旧京，永远是南宋历朝皇帝不能实现的梦想，因而主战还是主和，也始终是朝野此消彼长的政治话题。它虽然与新兴的蒙古合力灭金，雪了靖康之耻，但金国的屏障一失，又使南宋陷于唇亡齿寒的危难之中。强大的蒙古铁骑碾碎了文天祥独木支撑的老宅，帝昺的蹈海宣告了赵氏王朝的彻底毁灭，这是在祥兴二年（1279）的二月。

宋朝勉为其难地苦苦维持了三百多年，历代曾见的“盛世”，似乎与它无缘，它所有的只是竞争的倾轧、奸臣的弄权和人民的造反。宋代的文化发展趋势，也基本上与其积弱积贫的国力相应，尽管宋朝的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某些特点，文化巨匠也层出不穷，唐宋古文八大家，宋朝即占六人，但是从总体的格局和气度而言，它终究难以和强盛的唐朝所表现出的恢弘相比拟。即从本书讨论的书法一道来看，以“尚意”为特征的宋代书法所代表的尺牍书风，在唐人“尚法”的丰碑巨制的映照下，只觉得像兰苕翡翠，而唐代，则无疑是碧海鲸鱼。

大人物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它特有的发展规律。书法更重笔法的传承和艺术形式的借鉴，而宋代的书法在起点上就面临着严重的先天不足。这首先表现在客观方面。第一，书法自从实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样式之后，师生相传的“道统”一直未绝。即使像南北朝时的长期分裂板荡，但因王羲之本成长于东晋，所以“江左风流”也仍由羊欣、智永等人继承下来并传至唐代。五代的动乱，即发生在中原，而且数年就破坏一次，因此使这一绵长的传统遭到了致命的阻断。赵构《翰墨志》云：“本朝承五季（五代）之后，无复字画（即指书法）可称”，“书学之弊，无如本朝”^①。都是有感于国初现状的深切悲慨。五代之时，出了一个佯狂全身的杨凝式。苏轼认为杨氏在乱世出现有些不可思议，他说：“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画随之。杨公凝式笔为雄，往往与颜柳相上下，甚可怪也！”^②其实，除杨凝式之外，五代的武夫所写的字在宋人看来已经高不可攀。第二，师资人才的缺乏

固然是一个方面，而历代优秀书法遗产遭到兵灾的破坏，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唐人去魏晋未远，留存的名迹尚多，因而唐太宗有独尊大王的条件。然而经过五代的浩劫，名迹已大多散佚，只有相对平静的十国政权还保留了一些，但即使如此，最后也统统作为战利品被皇室接收。赵构云：“本朝自建隆（太祖年号，960—963）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民间纵有，也大多为贵戚勋臣所据。如太宗和英宗的驸马王贻永和李玮，皆拥有若干晋人名帖。就是像宣仁后之侄高公绘，目不识丁，尚且有不少名贵的收藏。尽管宋太宗后来命王著鉴定内府所藏刻成《淳化阁帖》，但当初也只有二府大臣才能蒙赐一套，因此它对于促进书法复兴所起到的作用实在非常有限。书法遗产的垄断所造成的后果，使真正有天才的书家失去了鉴古开今的良机。如米芾三十八岁时在李玮家见到晋贤十四帖，欲易不能，只得归来追想模拟几个字形，聊以自慰。直到五十岁他才从蔡京那儿用投水要挟的不光彩手段弄到十四帖中最使其心折的谢安《八月五日帖》。另如他为了与宗室仲爰争取王羲之《王略帖》，不惜花费“十五万钱”。这些都说明宋代书法要取得一丝进展，书家们付出的精力和物力比前代不知要多加几倍。宋代书家们大多以唐人为梯航，一则是因唐为近代，书迹还较易寓目，二则便是晋帖已成奇货的缘故。

宋代书法步履维艰的主观原因，我觉得是社会风气和政策法令的丕变。唐代书法之所以繁荣，其根本的原因是帝王的倡导和具体政策的落实，正因为有了这双重的保证，才使书法自上至下地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对此，宋人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周辉云：“唐（官）告，今士大夫家犹有袭藏者，虽吏辈所札，亦皆有法，况虞、颜名画乎？唐太宗亦尝谓辅臣曰：‘书学于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亦有学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宜乎臣下体上训饬，皆留意于翰墨。’”^③作为万乘之君，唐太宗一面向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弟子虞世南学习书法，一面为《晋书·王羲之传》作传论，从而奠定了一个朝代独尊大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榜样的力量固然无穷，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强

制性措施，这一提倡终归还可能是放任自流的。朱翌云：“唐《百官志》有书学，故唐人无不善书。远至边裔书吏里儒，莫不书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见也，往往胜于今之士大夫。亦由上之所好，有以劝诱之。贞观中，集王羲之书为一百五十卷，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以为弘文馆学士，内出法书，令之习学；人间有善书者，亦召入馆。海内向风，工书者众。”^④按《新唐书·百官志》，书学仅置博士二人，为“从九品下”，属最低一等的官阶。因此把唐人无不能书的原因归结为“有书学”，尚不能使人信服。我认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能算作是天下靡然风从的诱因，而对于中低级官员晋升考核有着书法的要求，则应是一个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最有效的措施。朱弁云：“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馀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⑤岳珂也说：“国朝不以书取士，故士亦鲜以书名家。”^⑥按《新唐书·选举志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五品以上不试。”这“楷法遒美”的具体要求，便促成了唐代楷书大盛的局面。其实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即建国后三年，亦有诏云：“书判拔萃，历代设科。顷属乱离，遂从停罢。将期得士，特举旧章。宜令尚书吏部条奏以闻。”^⑦所谓“条奏”云云，即命拟出具体条例上奏。不知是这道上谕始终未能实施，还是实行未久即告流产，总之《宋史·选举志》未见相应的内容。正由于唐时对读书人在科举进身和官吏考绩两方面的书法要求到宋代已不复存在，朝野不再以书法相尚，必然使产生大书家的土壤贫瘠不堪。但是毛笔还在使用，于是投机取巧的士子为了博得当世主文者的欢心，竭力模仿他们的书体。这种极其短视的实用主义做法，造成了宋代特有的“趋时贵书”现象。

穷则思变。真正为延续了百余年积弊而大声疾呼的是欧阳修。对书法现状表示忧虑并提出救治良方，应看作是他政治和文学改革的组成部分。他在编纂《集古录》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鉴赏能力，而且

认识到当代与古人的差距已至不可等闲视之的地步了。欧阳修与当时已处于书法顶峰的蔡襄一道，为促进宋代书法转机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实践努力，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他们三人都几乎没有老师的指点，而起手于唐人又使他们意识到横亘于前的“尚法”高峰实际上挡住了出路。正像好诗已被唐人做完，另辟蹊径将有极大的困难。然而苏、黄、米三家毕竟属于时代的骄子，他们通过知己知彼的权衡，突破了唐人的樊篱，闯出了一条“尚意”的新路，而帮助他们达到目的思想武器，即是禅宗。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起源于唐代中期，发展到宋代，已成为士大夫的宗教。这一方面是因为宋朝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倡导儒、佛、道三教并举，而已居佛教主流的禅宗，为了建立进一步适应社会的完备的理论体系，也吸收了较多的儒、道思想，使禅宗成为三教合一的最佳样板。另一方面，禅宗的这些转变，也改变了它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不少士子从坚决辟佛的立场，逐渐转向对禅僧抱有亲善的态度。如欧阳修晚年取号“六一居士”，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民族矛盾的深重和官僚制度的腐败，给士大夫造成不堪重负的心理压力，富贵无常、人命短暂，更使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禅宗教义中视人生如梦幻、生死无别，宣扬随缘任运即是解脱，强调一切现实问题的解决无非是自我心理的调节等等，正与士大夫的要求一拍即合。苏轼在黄州时开始热衷于参禅，与佛印、参寥等士大夫化的禅师频繁交往，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米芾晚年痛失爱子米友知，精神蒙受极大打击，方深觉“幻法有如是，不以禅悦，何以为遣”^⑧。禅宗正像一帖解忧消愁剂，而得到普遍的接受。在宋代，禅宗的面目有点不像宗教，简直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了。

禅宗思想无处不至的渗透，必然使宋代的文艺观也受到禅宗的影响。唐代深通禅理的王维，赢得苏轼极高的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⑨宋代的文人画的形成，就是发展了王维

的画风。那种讲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以能体现幽远虚静的“意境”为优的作品，正是禅宗“得诸象外”的“空”的迹化。书法虽无形象可言，但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书法理论，追求“无法之法”“不工之工”，主张“放笔一戏”“信手自然”，仍然贯彻着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等观念。禅宗“呵佛骂祖”、蔑视权威和不为法缚的胆魄，更激励了苏轼等人敢于批评前代大家，尤其是唐人书法的勇气。宋人的书论，往往带有禅家的“机锋”以启发人“顿悟”，有时又不免多涉随意，予人不得要领之感，显然打着禅宗语录和“公案”一类的烙印。总之，宋代书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与唐代拉开了距离。与唐人“尚法”的主流相比，宋人则更注重意趣的抒发和个人情感的宣泄，他们想写什么或怎么写，都表现出一种任情适性的自由，因此更接近艺术的本质。苏、黄、米、蔡“宋四家”，除蔡襄外，其他三人都以行草擅场，这种书体也向“尚意”书风提供了纵横驰骋的用武之地。

“宋四家”尤其是苏、黄、米，对北宋末年至南宋以及金朝的影响极其深远。尽管薛绍彭、吴说、赵构、姜夔等人倾向于复古，但是在崇尚新变的时代洪流中，他们不可能有扭转并提挈全社会的力量。

南宋虽有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四位名家，各具造诣，但其才力已无法与前贤相比肩。不过，在南宋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确实也难以孕育出大家了。有一个显见的原因，即“尚意”书风大行后不久，社会又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在蔡京为首的奸贼掀起的对“元祐党人”的残酷迫害中，苏、黄的大量书迹被禁毁。随后金人的野蛮掠夺和兵燹之灾对文明的破坏，更甚于五代之际。南宋偏安半壁江山，时时受到战争阴影的笼罩，更使人们从事书法的兴趣远逊于对生死存亡的忧虑。南宋人笔下已较少安闲的风致，尤其到末年，赵孟坚、陈容等人更显出狂躁之气。

南宋书法出现江河日下之势，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艺术思想的变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南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理学虽可看作是儒学的禅学化，发挥了禅宗的心性之学，但是他们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对艺术的观点，还是力图把它纳入儒家以道德为先的规范中。

去。理学家对书法的解释,以及品评的标准,不但仍信奉“心正则笔正”的教条,而且甚至可以用笔不正来反证其心的不正,那么这就从苏轼认为先验有疑人偷斧之嫌的批评立场上倒退了。另外,“尚意”书风注重无拘无碍的创作心态,认为“心不知手,手不知笔”的境界最堪嘉尚,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不期于工而自工的佳作。然而理学家却不承认这种“空”,他们强调心即是理,文便是道,于是创作心态的不同,必然导致艺术效果的差异。朱熹宁可全盘肯定蔡襄,也不放过时时对苏、黄、米横加贬责。他赞扬书名不大的韩琦、喻樗,甚至极口称赏根本不以书法著名的曾巩,归根结蒂即是因为他们字迹端正,有居敬之心。因此,品评是非取舍的标准到南宋已完全颠倒,而这所谓标准一旦借助学术正统的官方力量传播并深入人心,那么书法的艺术生命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宋代对书法史的贡献之一,即是刻帖的盛行和流布。太宗淳化三年(992)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为十卷,摹勒于枣木板上,时称《法帖》,后世又称《阁帖》或《淳化阁帖》。这部丛帖因王著学识不足而造成很多错误,但它对于历代书法名迹尤其是二王作品,有着化身百千的功绩。此后公私刻帖成为风尚。官方的有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的《太清楼续法帖》、徽宗大观三年(1109)的《大观帖》,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的《秘阁续帖》等。私人的有仁宗庆历五年(1045)刘沆的《潭帖》和稍晚潘师旦的《绛帖》、哲宗元祐七年(1092)刘次庄的《临江帖》、徽宗大观三年(1109)王宗的《汝帖》等。除了丛帖之外,还有某个当代书家的汇帖。如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禁中所刻《绍兴米帖》,全收米芾书迹;孝宗乾道四年(1168)汪应辰在成都刻的《西楼帖》,全收苏轼书迹。总之,宋代的刻帖已成一种社会风气,开了后世“帖学”的先声。

与宋代笔记、诗话等的繁荣同步,宋人各种与书法有关的杂著也非常丰富。题跋是宋代开始出现的特有的文学样式,简短而精辟,又往往随感而发,虽然还不能称为系统的书论,但是其中不乏智慧光芒的闪烁。后人把它们集以成书,对于研究某人的书学思想不为无益。如《六一题跋》(欧阳修)、《东坡题跋》(苏轼)、《山谷题跋》(黄庭坚)、《海岳名言》

(米芾)、《姑溪题跋》(李之仪)、《广川书跋》(董逌)、《翰墨志》(赵构)、《晦庵题跋》(朱熹)等。比较有系统规模的书学著作则有朱长文的《续书断》、米芾的《书史》、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姜夔的《续书谱》、陈槱的《负暄野录》等。宋代的民间收藏颇富,因而著录书籍便应运而生,这也是有开创性功绩的事情。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米芾的《宝章待访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岳珂的《宝真斋法书赞》等。

与宋朝共存的辽、金,它们虽都制成了本族文字,但是汉字的传统和书法的魅力对二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辽代并无我们所知的名家,今日能见的书法资料也多是正书碑版,相比较而言,金代书法就丰富多彩了。因为金统治着北宋淮河以北的土地,“遗民”中本就有比较杰出的书家,如任询和党怀英等。另外南宋使臣也有被留在金朝做官的,如米芾之婿吴激,这些人都成为金朝文坛的中坚。金至中叶,汉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上至皇帝贵胄,下至普通士人,皆以模拟宋朝书法为能。其代表允推王庭筠和赵秉文。金代书法挟河朔之气,有一种雄强的胜利者姿态,因此整体水平丝毫不比南宋低。

① (宋)赵构《翰墨志》,载《历代书法论文选》。

② 《苏轼文集》卷六十九《王文甫达轩评书》。

③ (宋)周辉《清波杂志·别志》卷下,载《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

④ (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载《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

⑤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九,载《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

⑥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蔡忠惠书简帖》,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

⑦ 《全宋文》卷二《宋太祖二·令尚书吏部举书判拔萃科诏》。

⑧ 《中国书法全集 38·米芾二》第 351 页。

⑨ 《苏轼文集》卷七十《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第一章

北宋前期的书法

卷之三

北宋建国之初，一切皆在草创阶段，书法自然是无暇顾及。直至太宗混一区宇，在其努力之下，书法才稍有起色。然而此时撑住门户的书家基本上都是来自十国的降臣。如徐铉来自南唐，王著、句中正、李建中来自蜀国，钱惟治来自吴越。这些人，有的学术见识短浅，有的艺术素质不高，但在专事模拟近代这一点上大致相同。他们书作的格调，多受到后人的疵议。在宋朝建国后出生的书家中，李宗谔、宋绶和周越有较大的影响力，前者靠的是出身和官位，后者则更多是凭自己的实力。还有一个隐士林逋，因其节操的高洁而书法亦带有清朗之气。总之，在宋代前三朝，书法尚未走上正规的轨道。

第一章

第一节

晚唐五代书风的延续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不愧是一代雄主，我们今天尚能在故宫所藏历代帝王像中看到他的尊容。觉得他既神情坚毅、威风凛凛，又目露杀气，使人慑于正视。这个出身于武将之家的天子，一生看惯刀光剑影，养成了凶悍的性格。因此，一旦垂拱天下，毕竟难掩其对文化的漠视和对文人的轻蔑。文莹《湘山野录》卷中：

太祖皇帝将展(汴京)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画，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着‘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①

赵普是宋朝开国元勋，时人称“赵学究”，应该算是有些文化。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古来匾额凑满四字的传统格式他还是明白的。如果说上面一则记载中太祖还带有玩笑性质，那么下则便是人格污辱了。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遂命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汝争得如他多识！”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命洗去。^②

如此一个视文儒如刍狗的君主，他对文化重建的兴趣是可以想见的。他宁